

N 本期聚焦

历史虚无主义的“偏见”

谭扬芳

最近几年，历史虚无主义思想越来越多地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散播错误观点，影响社会认知，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深入探究起来，历史虚无主义在价值观、方法论、认识论上分别体现着利己主义、形而上学、主观主义，进而由此构成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特征。当前，我们唯有对其“真实面目”进行深刻剖析，才能更好地避免为其所扰、所惑。

价值观上的利己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者之所以歪曲、否定、篡改历史，目的无非有二。

一是沽名钓誉。有些人凭空捏造所谓“新的历史材料”，并自诩为“新发现”，以图赢得“历史学家”之名或是其他目的。但这种建立在子虚乌有的材料基础之上的观点难以经受得起历史的检验。二是换取经济利益。他们借助新媒体平台的强大传播功能和广泛受众群体，炒作、散布其错误观点。有些人以所谓的“新发现”引来关注之后，就会借助网络等新媒体迅速“华丽转身”为市场经济掘金者。他们更在意自身虚名和实利的满足，完全不顾由此可能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和危害。

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

历史虚无主义者惯于打着揭露历史真相的旗号，虚构历史事实，“忽悠”群众，用各种形而上学的方法对其观点进行包装和掩饰。

其一，只看问题，不看成绩。既然是历史，特定时期内必然有历史成绩，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局限。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者有意忽视、否认、歪曲若



下“黑手”

洪琥 作

干历史事件或人物。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他们视而不见；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视而不见；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以飞速提升，他们也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历史虚无主义者紧盯历史上的种种失误和错误不放。他们或无限夸大地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土改中的极“左”行为，以此否认整个解放战争的合理性；或大力渲染社会主义改造搞得过早、过急，以此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合理性；或刻意突出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社会道德败坏等现象，以此否定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历史成就。

其二，只看细节，不看整体。历史虚无主义者总是从个别细节入手，有选择性地对待、评价甚至戏说历史人物，妄图以偏概全蛊惑民众，达到一叶障目之效。一方面，有意选取若干细节来否定、抹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和英雄人物。例如，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创立新军队、建立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等丰功伟绩视而不见，却大肆宣扬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甚至杜撰若干历史细节，试图以此来全面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的执政合法性。另一方面，对中国历史上那些试图“逆流而上”的历史罪人，却有意渲染、美化甚至翻案，混淆广大群众的思想认知。

其三，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历史虚无主义者往往用个别事件的表象充当历史的本质，把支流当主流。例如，他们罗列大量表象，将中国共产党描绘成战争的“坐享其成者”和“不劳而获者”，以否认其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他们机械地认定只有传统的运动战、防御战才可以真正打击敌人，对同样发挥关键作用的敌后游击战避而不谈；他们只看到国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忽视、否认在抗日战争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历史虚无主义者只看到了抗日战争初期的正面战场，没有认识到战争的发展变化和本质，更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才是中国共产党最终赢得抗战胜利的力量源泉。

认识论上的主观主义

认识源于实践。历史虚无主义者的种种谬论多是立场先行，从主观感情、愿望、意志出发，从狭隘的个人经验或本本主义出发，对实践进行歪曲反映。

一是割断认识与实践的联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而历史虚无主义者不作调查和研究，主观臆想出一些所谓的“历史细节”，并以此来修正、颠覆历史主流观点。同时，他们仅仅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到一点“新发现”，不予任何分析和考证，就妄称为重大发现，加以大肆鼓吹。不作详细调查、研究就轻易下结论，这显然是违背基本认识规律的。

二是割裂感性与理性的联系。历史虚无主义者看待历史充满着极度感性。一方面，他们有选择性地对待历史。“爱则加诸膝，恶则坠诸渊”。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眼里，历史不过是一个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如此找出的历史材料、得出的历史观点，还有多少可信度呢？另一方面，他们将历史看作简单的直线，似乎历史就应该完全按照他们的设想去走，或者按照一条直而又直的路线去走。这种缺乏理性且极度随意的治史态度，置于历史长河之中，不过是徒增笑料而已。

三是混淆真理与谬误的界限。真理有其存在的范围。对于历史虚无主义者而言，历史背景从来都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可以随意地裁剪或评价历史，或是用过去教条化的结论来评判鲜活的现实。由此得出的结论自然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任何恣意增添个人主观色彩的历史评判都与真理相悖。

综上所述，历史虚无主义者从价值观、方法论到认识论，无不充斥着利己主义和主观色彩，遍布着偏见。这样的所谓“研究”，一定会被真正科学的历史研究所取代。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N 学者观察

结构性问题集中表现为“四个脱节”

刘尚希

我国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包括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区域城乡结构等等。结构性问题从来都是整体性问题，事关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发展的新动力。其中，结构性问题集中表现为“四个脱节”。

一是金融与实体经济脱节。当前的结构性问题之一，就是金融与实体经济脱节，导致实体经济的萎缩，从深层次导致生产与消费脱节。金融在自我循环、自我扩张。经济在金融化，而金融在泡沫化。金融在不断创新，但主要是在玩钱生钱的游戏，而这些钱很难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融资难融资贵是集中表现。一方面，货币供应量在不断扩大，货币政策“放水”；但另一方面，利率还是高企，现在融资的成本还是很高。地方的各种投融资平台，包括相当一部分企业，尤其中小企业，融资既难又贵。实际上这些都反映出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产生了严重的脱节。不仅如此，金融自我循环扩张，还产生了一种“虹吸效应”，把实体经济领域的资本吸到金融体系里。影子银行规模迅猛扩大，整个经济的杠杆率不断上升，这都反映出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脱节。这个脱节问题解决不了，要稳增长、调结构，实现经济转型、升级，达到供给与需求新的均衡，那几乎是不可能的。由此看来，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迫在眉睫。

二是科技与经济脱节。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不断快速增长，对企业和科研院所的研发，也有很激励性的政策。即使财政收入下滑，科技创新投入增长还是挺快的。但是，我们现在大量科技投入，并没有带动经济增长。我国重视科技创新，但是科技创新与经济是脱节的。主要是因为科技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导致科技与经济脱节。这是一个大的结构性问题。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关键要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

题。科技与经济脱节，我们的科技创新，就很可能是开天挂在空挡上，你再踩油门也不管用。

三是教育与发展脱节。我国面临的就业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个矛盾怎么出来的？与长期僵化的教育体制有关。教育和国家发展阶段不匹配，是脱节的。我国的教育，没有及时跟上我们发展阶段的变化来进行适应性调整。尽管这些年，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但是效果不是太明显，量升质不优，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在就业上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把这个问题放到整体上来看，我们的教育和发展是严重脱节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者持续迁延，创新驱动也很难真正落地。

四是中央与地方分工合作的关系脱节。发挥两个积极性，中央与地方本来应该是分工合作的关系，怎么把事权划分好，这是一个纵向治理结构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依然讲的是财力与事权相匹配，要达到这个目标，一方面要调整财权，一方面要调整转移支付，更多是要调整支出责任，要调整事权。

当前国家治理的重心过多下移，会扩大国家治理的风险。从财政支出来看，全国85%的支出是在地方花的，中央只花了不足15%。支出责任的过分下移，意味着行政治理过分下移。如何把适合中央来做的事情交给中央来做，适合地方决策的事下放给地方来决策，这是治理结构改革的内容。当前简政放权主要是针对决策权，推动适合地方的决策权下移。用国家层面治理和地方层面治理的两级治理框架来考虑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划分，是结构性改革必须考虑的核心问题之一。

(作者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来源：中国金融

观点集粹

“新的社会阶层”的十大特征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廉思、副教授冯丹在《学习时报》刊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社会阶层应运而生，主要包括私营企业和外企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概括地说，其特征如下：一是人口构成上以“新生代”为主体，年龄越大，人数越少。二是经济地位上属于中等收入阶层，但收入分化比较明显。三是空间分布上呈现以大城市为中心的辐射状态。

四是职业构成上知识型、技能型特征明显，岗位变动频繁。五是业态上以服务业为主体的梯度布局，并呈现“体制外”生存特点。六是群体类型上分化组合形态多样，群体自我扩张、进化能力明显。七是社会交往上“线下线上”交错，关系网络复杂，跨群体触发力强。八是利益诉求上因来源不同而各异其趣。九是政治立场上支持深化改革开放，但对社会有一定批判性。十是价值观念上相信知识改变命运，但具有较强的危机意识。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轮改革与1999年那一轮改革相比，尤其重视顶层设计。中央对于改革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投入了极大的能量。每个星期，国务院常务会议都会出台改革的相关文件和政策，而中央每个月都有一次或者若干次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性意见出台。所以，这一轮改革的不得力是不能以中央政策不到位来解释的。相反，目前的情况是上热下冷，中央各种各样的政策传递到基层出现了落实不力的情况。这是本轮改革进展缓慢的症结所在。

笔者曾经去一些国有企业调研，有国有企业的领导跟我讲，他们原本已经做好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但是地方领导却往往拿出中央有关改革文件中的某几条作为依据，迟迟不愿批准有关的国企改革方案。面对当前上热下冷、落实不力的改革困境，该怎么办？

现今，在改革推进问题上缺的是一个个鲜活的案例，缺的是具有标杆意义和榜样作用的改革样本。在改革方面，不缺各种指导意见，不缺各种原则，不缺各种说法、各种理论，当前缺少的是如何把这些理论贯彻到一个个改革的案例中。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如果有两个具体的央企或者国企改革的实操案例，就能给其他的国企树立榜样，让大家去学习，去模仿，去超越。

N 有此一说

改革的方式需要改革

李稻葵

改革进入深水区后进展有些缓慢。最常见的解释是改革进入了深水区，问题更复杂，容易改的已经改了。这种解释肯定有其道理，但不能以此为借口，产生畏难情绪，拖延改革。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轮改革与1999年那一轮改革相比，尤其重视顶层设计。中央对于改革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投入了极大的能量。每个星期，国务院常务会议都会出台改革的相关文件和政策，而中央每个月都有一次或者若干次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性意见出台。所以，这一轮改革的不得力是不能以中央政策不到位来解释的。相反，目前的情况是上热下冷，中央各种各样的政策传递到基层出现了落实不力的情况。这是本轮改革进展缓慢的症结所在。

笔者曾经去一些国有企业调研，有国有企业的领导跟我讲，他们原本已经做好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但是地方领导却往往拿出中央有关改革文件中的某几条作为依据，迟迟不愿批准有关的国企改革方案。面对当前上热下冷、落实不力的改革困境，该怎么办？

现今，在改革推进问题上缺的是一个个鲜活的案例，缺的是具有标杆意义和榜样作用的改革样本。在改革方面，不缺各种指导意见，不缺各种原则，不缺各种说法、各种理论，当前缺少的是如何把这些理论贯彻到一个个改革的案例中。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如果有两个具体的央企或者国企改革的实操案例，就能给其他的国企树立榜样，让大家去学习，去模仿，去超越。

在去杠杆、去产能的过程中，如果有若干具有典型意义的行业或者企业实施破产重组，整体情况将产生可喜的变化。所以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不仅要有顶层设计，也许还需要抓住一些典型的案例，一竿子到底，直接为改革的推进提供指导。这些改革的事例最好是综合性的，而不仅仅是对个别的企业有典型意义。比如讲，笔者长期关注的中国摩托车行业，自2008年以来产量逐年下降，年销量下降7%-8%，如今马上要沦入落后于印度的衰退局面。

究其原因，在这个行业的发展中，各级政府管理方式简单粗暴，禁摩限摩限制了摩托车在城市的发展，限制了中国摩托车行业的升级，让老百姓两轮出行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时，摩托车行业也是低水平竞争、生产能力高度分散的牺牲品。摩托车行业的停滞不前也直接导致了我们的城市交通过于依赖小汽车和公交这两种方式，而不是两轮车、四轮车与公交齐头并进的高效率局面。

国际上有研究表明，道路上有5%-10%的两轮车，是最高效的通行格局。摩托车行业好比一只麻雀，抓住像摩托车行业转型升级这样有代表性的案例，解剖这只麻雀，解决它的问题，具有全面的指导意义：其中，既需要解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也要解决环境污染标准的问题，还要治理产业竞争无序的问题。解剖这只麻雀，有助于推动相关领域的改革前进一大步。

总而言之，改革的前景值得期待，但改革的方式需要改革。改革应该从抓案例开始，把顶层设计与一竿子到底树立典型的方式结合起来。这样一定能带来新一轮改革春风，中国经济因此也能上一个台阶。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N 中外历史

传统孝文化的价值重释

韩美群

传统家庭孝道并不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形态，而是一种具有开放性和扩展性的伦理道德规范。具体来说，作为家庭伦理的孝道思想，从调节家庭、家族关系开始，向外推衍而成为社会伦理规范和国家政治规范，完成了从私德向公德的伦理转换。

如果说作为私德之孝主要规范的是亲子伦理关系，那么上升为公德的孝，如对四海兄弟的孝悌思想，对国家的孝忠思想、孝廉思想等等，主要规范和协调的便是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关系，对于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国家统一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在家国同构的传统社会，由于受到宗法制度、封建专制集权等多重影响，孝文化“孝忠道”传统中还存在一些亟待摒弃的消极因素。例如，在“三纲”的伦理关系中，“君臣体系”“父子体系”和“夫妻体系”都被专制统治者追求的功利性所取代，演变成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孝文化的权威意识和等级特征逐渐强化，“父为子纲”“君为臣纲”的尊卑等級森严，父权、君权至高无上，等级化、权威化趋势日益增强，严重扭曲了人性，扼杀了平等的价值观念。

从伦理道德与政治规范的视角来看，传统孝文化虽然曾走向极端化，甚至被异化和畸形化，但是，其在维系人心、稳定社会价值等方面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哪怕在今天，其对于塑造和谐思维、构建和谐社会、推行和谐世界理念等等，都将发挥极

其重要的作用。我们一方面要结合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重新认识孝文化，赋予传统孝文化以新的内涵，促使其创新和转化；另一方面要结合民族特征和现代人文精神，重新审视和批判继承传统孝文化，促使其去极端化、去封建化、去等级化、去愚昧化，建构新型孝文化。

“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是儒家学说的理论核心。以此为逻辑起点，经过推衍和演化，逐步发展为中华文化的中心。“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第二十章》)何谓“亲亲”？“亲亲，仁也。”(《孟子·尽心上》)简单地说，“亲亲”即爱父母，是原生意义的“孝”，亦就是“仁”。根据以上理解，可以看出“孝”与“仁”同宗同源。

具体而言，“孝”是“仁”的出发点和基础，亦是仁爱伦理的最低底线或第一伦理原则；而“仁”是“孝”的扩展，亦是“孝”的核心理念与文化精神。从价值内涵上看，孝仁文化具有三层内蕴。一是孝悌，为行仁开源；二是仁爱，为达道立本；三是守道，尊重自然规律，尊爱万物法则。

孝仁文化的三层内涵层层推衍，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最终上升为一种自觉的文化精神，在中华浩瀚的文化长河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作为中华文化的总体性把握，孝仁并不是一般性地停留在人们的主观情感上，而是广泛渗透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成为个体生存和社会运行的主导文化模式。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来源：光明日报

“过早去工业化”的思路值得警惕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斌在《证券日报》刊文指出，实体经济面临着成本高居不下的压力，如果未来服务业不断取代工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很危险的，即服务业取代工业化，造成去工业化。以前每年一千万农民工转到城市，大部分进工厂，少部分进了服务业。最近几年农民工还在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市，城市化还在持续，但进入城市以后，越来越多的进城务工人员进入第三产